

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

王 栋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不同的理论框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出发,以《中苏关系史纲》提供的素材和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内最近解密的省级档案等史料,对中苏分裂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审视中苏关系,以期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关联政治 中苏分裂

从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到1991年苏联国家解体的74年间,苏联与中国20世纪的革命和变迁息息相关。然而,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表述背后,是中国与苏联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

* 本文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沈志华、李丹慧、王逸舟、张小明、张清敏、陈琪、石斌、高远戎、郭洁、梁晓君、朱丹丹、周陶沫等人的批评与帮助,谨此感谢。本文曾提交“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2009年会‘冷战与中国’讨论小组”,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参与小组讨论者对本文提出的批评。笔者还要感谢四位匿名评审,正是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使本文避免了许多谬误。当然,本文所有不足和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09/4(总第20期),第63—91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关系的变迁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均势的变化和冷战进程。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中外冷战史学界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对中苏同盟的起源、中苏分歧的原因等中苏关系重大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也构成了国际冷战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对话桥梁,对国际冷战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以下简称《史纲》)为 20 世纪中苏关系的变迁呈现了全景式的图卷,是中国冷战史学界最重要著作之一。《史纲》一书,以丰富史料为基础,对中苏关系变迁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了不同于以往官方史学的解释,使人耳目一新。《史纲》融合了几位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精华,如杨奎松对二战时期中苏外交、国共内战与中苏关系的研究,沈志华对中苏结盟和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研究、对苏联贷款以及苏联援助中国核弹研制的研究,李丹慧对伊塔事件、中苏援越矛盾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研究,等等。从史料运用来看,《史纲》真正达到了“多边档案研究”(multi-archival research)的要求。可以说,《史纲》不仅是中国冷战史学界的一部扛鼎之作,也代表着中国冷战史学界对国际冷战史学界的贡献。

从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史纲》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原始数据,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重大理论争论。诚如时殷弘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者和研究者首先应当知道甚至比较熟悉历史,同时对历史有理论化的思考,从中升华出历史的内在含义和具有历史共性的道理”。可以说,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国际关系学者,学好专业领域的东西就可以了,但要成为优秀的国际关系学家,则一定需要对历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7年版。
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页。

训练和浸淫。真正优秀的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指的是从事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的作品往往具备宏大的历史眼光和穿透力,蕴含深邃的国际政治思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如保罗·肯尼迪、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人的著作。

在笔者看来,《史纲》对中苏关系的分析可以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和冷战史学者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不同的理论框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出发,并以《史纲》提供的素材和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内最近解密的省级档案馆的史料,对中苏分裂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

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认为国际政治的特性以及对外交的关注更多的体现在历史著作中而不是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怀特甚至提出如下的简约公式:“国际政治=历史阐释”。王逸舟认为持类似怀特见解的人往往是真正的“智者和大儒”,其著述“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显示了好的国际政治理论必备的历史属性”。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引论》第7—9页。怀特的观点见其发表于1966年的著名论文《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参见Martin Wr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5), pp. 15—35。美国学者结合理论与历史的典范可参见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Deborah W.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加迪斯自身也强调冷战研究对于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参见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1992—1993, pp. 5—58。与加迪斯相呼应,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冷战史研究的重要性。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第17—19页;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7—14页。

中国目前中央一级的档案馆(如中央档案馆、各部委档案馆等)对外仍然基本不开放。唯一例外的是外交部档案馆。从2004年1月起,外交部档案馆经过数次解密,目前已解密到1965年。此外,许多省级档案馆近年来也解密了部分新中国时期的档案,有的解密步伐甚至快于外交部档案馆。笔者曾经先后查阅了江苏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西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等地的史料。各地档案馆解密时间段、侧重点各有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地方相比,江苏省档案馆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历年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文件,其中有很多中央领导人、各部门负责人的内部讲话。这些讲话,因其是对内的,很多时候比外交部保存的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记录等档案,更能反映当时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上的真实想法。本文使用的第一手史料主要来自于江苏省档案馆以及北京市档案馆。

一、解释中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

(一) “国家利益 权力 说”与“意识形态 说”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是外交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解释美苏冷战起源的主要理论取向。现实主义者侧重于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冷战是美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二战结束和纳粹德国的崩溃在东欧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观念主义者则认为,冷战主要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分歧的浮现与不断扩大,中苏分裂的课题进入外交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第一批研究中苏分裂的学术著作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出现。尽管这一批学者对于中苏分歧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出发审视中苏关系。

哈德逊(G. F. Hudson)、理查德·罗文索(Richard Lowenthal)和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具体表现为中苏在去斯大林化、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事务上的矛盾——乃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但在次年出版的第一本研究中

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研究文献中,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t)与修正主义(revisionist)、后修正主义(post-revisionist)分别将冷战归咎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美国的扩张主义以及安全困境的悲剧,但就其理论取向而言,皆不脱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权力范畴,二者成为不同派别学者阐释冷战起源的共同理论框架。主要的传统主义者包括 Arthur Schlesinger, Herbert Feis, Adam Ulam, Philip Mosely, George Kennan 和 Henry Kissinger等。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 Gabriel Kolko,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omas McCormick 和 David Horowitz。后修正主义者包括 John Lewis Gaddis, Geir Lundestad, Daniel Yergin, Robert Pollard, Melvin Leffler 和 Marc Trachtenberg等。有关文献综述可参见 Howard Jones and Randall B. Woo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and the Near Eas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7, No. 2, 1993, pp. 251—310; Melvyn P. Leffler, “Interpretative Wars over the Cold War, 1945—60,” in Gordon Martel, e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1890—1993* (London: Routledge, 1994);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3, 1983, pp. 171—190.

Richard K. He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 *Ending the Cold War: Interpretations, Caus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7.

G. F. Hudson, 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Praeger, 1961).

苏分裂的专著中,唐纳德·扎高利亚(Donald Zagoria)则认为,共同意识形态和制度联系是中苏关系的凝聚性力量,相对来说,民族差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关系的分离性力量。随后威廉·格利菲斯(William E. Griffith)则进一步发展了权力政治的观点,提出中苏分裂的根源在于中国试图成为大国的雄心与苏联试图阻止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矛盾。1968年约翰·基廷(John Gittings)则重新回到意识形态论的观点,认为中苏分裂的主因是关于世界革命正确道路的争论。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使国家利益论重新占据上风。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全面军事冲突的阴霾似乎使意识形态的因素变得无关紧要,学者们开始关注中苏国家利益范畴之内的冲突,包括中苏之间的历史冲突和边界争端等。中苏珍宝岛冲突以及随后的中美和解,使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解释和均势理论更具说服力。

在冷战结束之后兴起的新冷战史学中,学者们展现出不同于早期中苏关系研究者的取向与视角,开始广泛地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在文献中重新得到重视和强调。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新冷战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康奈尔大学教授陈兼。陈兼批评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和外交史学界忽视意识形态因素对一国外交政策制定影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研究冷战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史学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从物质的层面界定“权力”这一核心概念,而忽视观念的力量。陈兼认为,新冷战史学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意识形态很重要”。他进而提出意识形态不仅是中苏结成同盟的原因,也是使中苏分裂的决定性因素。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William E. Griffith, *Sino-Soviet Relations, 1964—1965*.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8).

Harrison Salisbury,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9); Tsien-hua Tsui,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in the 1970s* (Ontario, Canada: Mosaic Press, 198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 6.

(二) 意识形态的两重性以及意识形态解释的局限性

意识形态具有两重性,一是工具性,二是真正的信仰系统。关于其工具性的一面,罗伯特·艾克莱肖(Robert Eccleshall)曾论述道:“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领域——人们在追求具有分歧性的利益时在这个领域里使他们的行为变得清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则指出,国际政治的真正性质——权力斗争——“被意识形态的辩护和理性化所遮掩”。同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也认为,意识形态是同盟对其自身进行“合理化”的基础;通过“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和勾画对未来的计划”而为同盟凝聚力提供主要的前提条件。作为真正的信仰系统,意识形态是一组界定社会应该如何运作和组织的观念,是人类最为基本并且稳定的信念。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敌对关系,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必将被革命所推翻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从现实主义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产生权力和安全的来源。通过在国际体系中复制、推广其国内的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可以增加直接干涉和控制他国国内事务的程度、获得追随者的“意识形态效忠”,而最终能够在国际系统中提高其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位置。意识形态的两重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苏同盟产生与消亡的机制:中苏结盟时,双方看重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系统;中苏分歧时,双方利用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功能。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对于信仰者来说,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性,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调和主义或修正主义都是信仰的敌人。同时,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适应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的政治秩序。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更是把建立具有高度觉悟、严密组织和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社

Robert Eccleshall et al,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4), p. 2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A: McGraw-Hill, 1948), p. 99.

George F.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1.

Nigel Gould-Davies,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 No. 1, 1999, pp. 90—109.

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秩序中,一国之内有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居于领导地位,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有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居于领导地位。

陈兼认为,中苏分裂“并不是由于不可妥协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而是由对相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导致的。”然而,如果中苏分裂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对相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而不涉及任何利益的纠葛,那为什么不能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心平气和地解决分歧,达成共识,或者“求同存异”呢?如果对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仅仅是观念上的分歧,那中苏似乎都没有理由使这种分歧不断扩大以至影响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很显然,问题在于,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关乎权力的控制、掌握与安排。意识形态不仅为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而且本身也可能是行为的意义所在。从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来看,中苏分歧时双方都坚持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争论实际上“遮掩”了中苏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以中苏论战的缘起和发展为例,虽然表面上中苏论战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关于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战争与帝国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但背后是关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具备了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合法性。这也正是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与苏共展开论战的原因。

由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中苏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于是这场争论本质上便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对苏联来说,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中方重复帝国主义侵略性的观点是教条主义者的认识;而中国却认为修正主义“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它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力求贯彻‘和平共处’的总路线,幻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9.

事实上,通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求得解决”中苏分歧曾是中共的方针,参见国务院外办:《关于对外宾进行宣传的几点意见》,1962年4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案卷号:208,全宗号:102市人委外事办公室,第4页。

想同美帝国主义平分秋色。”面对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对中共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以及所蕴含的意义心知肚明。科兹洛夫在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论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如《史纲》评论的,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意图在于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目的是事关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斗争。因为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实际上关乎权力的控制、掌握与安排,一旦证明了谁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列主义观点,谁就有资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领导地位,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

中苏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在时隔近 30 年之后,于 1989 年 5 月接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中苏关系破裂“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同样也不正确”。回顾当时中苏意识形态的激烈论战,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苏联没有摆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处在不平等地位,感受到的是被蔑视和屈辱”。作为当事者,虽然时过境迁,邓小平的看法仍不免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事实上,《史纲》的研究显示,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赫鲁晓夫非常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有些委曲求全地维护与中国的团结。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大发雷霆,赫鲁晓夫马上飞到北京当面解释并试图安抚毛泽东的情绪。在 1958 年台海危机中,赫鲁晓夫又积极表示愿意提供空军和导弹部队支援中国收复金马外岛。当然,赫鲁晓夫维护与中国的团结有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考虑,这在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朱可夫等人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邓小平的评论暗示中苏分裂的原因在于,苏联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位置,这比较接近格利菲斯“权力政治”的观点。但是,反过来他的评论或许也说明,中苏分裂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试图挑战和

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传达要点》,1962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案卷号: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265页。

同上书,第265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450—451页。在这些关键的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巩固了其在国内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特别是第5、8章。

取代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位置。

(三) 国家利益解释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利益作为学术概念被引入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中国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引入“科学主义”的范式来对国家利益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学者们也开始运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苏分裂。从理论范式来看,《史纲》对于中苏分歧的理论思考,要比单纯的国家利益决定论更加精细和复杂;至于意识形态,《史纲》基本侧重于分析其工具性的一面。

国家利益论虽然已经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和中苏关系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仍然面临方法论上循环论证的困境与尴尬。如果两国交好,这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而两国交恶,仍然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的解释于是变成永远是后验的而不是先验的法则。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上,过分简单的国家利益解释通常变成了循环论证的逻辑:中苏结盟是因为国家利益需要,而中苏走向分裂是因为国家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决定论在解释中苏关系的变迁上面临着许多困难。譬如,简单的用国家利益的分析,并不能解释中苏从结盟之初就具有的猜忌与不信任。从意识形态、战略和安全利益以及经济利益来看,苏联需要新中国加入苏联集团,中国也需要与苏联保持联盟关系。然而,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并非一帆风顺,这与斯大林的个性和特质有很大关系。

在对斯大林的分析中,国际冷战史学界倾向认为斯大林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精通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固执的意识形态者。新冷战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沃伊泰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尽管斯

有关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文献回顾,参见方长平:《中国国家利益研究》,载王逸舟、袁正清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0—312 页。阎学通对中国国家利益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孙其明:《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第 20—26 页。

大林坚信其意识形态,革命对他来说毋宁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目标本身。”马斯特尼的这一观点在《史纲》的研究中也得到充分的佐证。当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斯大林这样的现实主义者通常会选择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以二战后期蒋介石政府与苏联谈判出兵东北为例,为获取外蒙利益,斯大林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承诺放弃援助其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中国共产党。

这点在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过程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自动带来“温情脉脉”的同志式友谊,“为友谊干杯”的觥筹交错背后则是利益计算的角力与争夺。苏联最初设想的新条约和协定的各种草案完全沿袭1945年签订的旧的中苏条约,意在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目标。在谈判过程中,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中苏双方反复拉锯,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最后谈判结果看,尽管中国领导人极力争取,但在苏联专家援华待遇、苏联对华贷款条件、成立合营公司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平等和损害中国主权的情况。特别是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后来说他从斯大林那里“虎口夺食”,此话虽不免带点毛式特有的夸张,但应该离实情不远。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强硬立场,在这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中国的重大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势必遭受更大损失。

当然,在中苏关系中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压过国家利益的时候。以1964年2月至8月中苏边界谈判为例,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出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作风。时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在谈判中屡屡以火药味浓重的发言尖锐指责苏联蚕食中国土地。如在3月16日和27日的第三和第四次谈判中,曾涌泉以激愤的语调斥责道:“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

当然斯大林是否信守承诺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斯大林“毫不含糊”地答应蒋介石要求苏联宣布不援助中共的条件,这说明在斯大林的考虑中意识形态的分量远不如利益来得重要。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77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102—109页。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112页。

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曾涌泉在第四次会议的结束发言时语带威胁道，如果苏方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中国就要“恢复自己“对于被占领土的历史权利”。

事实上，从中国当时的国际战略环境来看，不纠缠历史旧账，以求缓和的目的和务实的态度争取解决边界问题，应该说更符合中国战略和安全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也是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曾有的思路，但这种思路被毛泽东认为是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毛泽东 7 月 10 日对日本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一番著名的关于算领土账的谈话。这样一来，边界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之后一度出现的缓和局面再度激化。在 7 月 30 日重开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在毛泽东谈话精神的武装之下，再度转入攻势，摆出控诉的架势，会谈充满政治斗争的气氛。在毛泽东谈话的刺激之下，苏方的立场也转趋强硬，双方谈判已难以为继。可以说，意识形态激进化对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纲》论证指出，中苏论战造成的意识形态激进化，使中国在边界谈判中采取僵硬立场，“以进攻、好战的姿态，争所谓的正义、原则”，这“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对边界事务的影响”。

那么，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变量本身的关系如何？两者的交互作用又如何影响中苏关系的进程？这些问题非常宏大，显然超过了本文能力所及。这里只略作阐述。首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影响、限制和塑造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深层并不主张国家利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和国家一样，都具有阶级性；只有统治阶级利益，没有抽象的超越阶级之上的所谓国家利益。而且共产主义理念相信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可以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统一起来，无产阶级掌权之后，追求的是超越国家或民族利益之上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国际利益”，这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革命理念的理论基础之一。

其次，仔细观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理解会逐渐发生改变。随着世界革命冲动的消退和政权生存环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 360 页。

同上书，第 362—364 页。

这里的探讨得益于与沈志华、李丹慧的讨论。

境的变化,执政的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实质上涵盖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中,于是国家利益也逐渐成为其战略思考以及外交行为上(虽然不一定在表述上)的理性选择的重要依据。这种认知上以及反映在战略、外交行为上的变化,在苏联大约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则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

再次,中苏的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是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所说的国际系统的结构对单元行为体(如国家)的压力所造成的国家行为的趋同效应。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行为体的行为受到系统结构性的约束,“结构鼓励国家的某些行为,惩罚那些不响应鼓励的行为。”国家进入国际体系时,可以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认知和偏好,但系统的结构压力(如无政府状态、自助、不确定性等)通过社会化过程和竞争过程两个主要机制筛选、淘汰不适应系统的国家行为,鼓励适应系统的国家行为,从而使国家行为最终趋同。国家不管其国内属性(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如何,借助学习或模仿等机制,通过“社会化”和竞争的过程最终逐渐变成国际政治中“同类单位”。

从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来看,中苏分歧的根源很可能在于二者在国际政治系统的社会化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苏联已基本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随着意识形态激情的逐步消退和国际体系系统压力的存在,苏联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及其战略偏好逐渐发生变化,从主张世界革命、试图改变甚至推翻现存国际体系的激进“革命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逐渐变成要求维护现存国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9—90页和第154—155页。有关国际关系中学习理论的综述,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12章。社会化这一概念后来在建构主义的理论探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对新现实主义“社会化”概念的批评,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SEAN Wa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16。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概念,限于篇幅,并不准备对这一概念进行辨析。

关于这点,沈志华有类似的分析。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38和475页。

国际秩序的“现状国家”。相对而言,中国仍是具有强烈挑战性、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冲动与意识的“革命国家”。中国被国际政治系统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这决定了中国的战略偏好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认知,仍深受世界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权力分布的格局决定了中苏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权力位置,从而决定了中苏具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与认知,进而导致不同的外交政策选择。当时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道:“我们反对的主要是美国,苏联外交主要是对美国乞求妥协,我要反,他要和,怎么会合得拢?”此话直观地反映这一深层动力机制。

表-1 中苏社会化程度、意识形态影响以及外交政策选择比较

单元行为体	权力分布格局	社会化程度	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战略偏好	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认知	外交政策选择
苏联	全球支配性超级大国	高	居于国际体系中心	维持现状	受世界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浅	缓和、和平
中国	地区性中等强国	低	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	改变现状	受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深	紧张、革命

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导出如下可证伪的假设:(1)一个国家被国际政治系统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其战略偏好越倾向于维持国际秩序的现状;(2)一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认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越深,其战略偏好越倾向于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

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概念指的是一国的战略偏好为“改变现状”,这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常说的修正主义不是同一概念。沃尔兹曾举苏联为例说明拒绝遵守国际惯例的国家最终被国际政治系统社会化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初掌政权时,深受激进意识形态影响,鼓吹世界革命,藐视国际规范和外交惯例,拒绝接受社会化以适应国际体系。托洛斯基宣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外交部长,他“会对各国人民发表革命宣言,然后合上文件集离开”。然而,国际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压力是如此之大,一旦拒绝按照国际规范和规则进行博弈,就会陷入不利境地,甚至“冒自我毁灭的危险”。沃尔兹指出,苏联外交立即感受到这种压力。到外交部长契切林参加1922年热那亚会议时,列宁告诫其“不要说大话”。这个时候契切林已经更像一个传统的外交官而不是革命者,“为了达成交易,不去使用煽动性的词语”。参见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54—155页。

《章汉夫同志第一次的讲话(记录)》,1962年11月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45 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这里的假设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限于中苏关系,表明冷战史的案例可以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推导与构建。从结构现实主义观察,中苏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的论战既有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更源于不同权力地位的战略偏好和外交政策选择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对于中苏关系的案例来说,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中苏相对权力位置的变化是如何导致不同外交政策选择的冲突并影响中苏同盟关系。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假设(不妨称之为“假设3”):当中苏在意识形态化程度上的差异相对恒定时,中苏相对权力位置的变化越快、越大,则中苏外交政策选择产生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苏同盟关系受到的冲击和削弱就越大。

从中苏关系发展的轨迹来考察,假设3似乎可得到验证:当中苏分歧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萌芽之际,恰恰是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之时。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相形之下,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呈日益崛起之姿,国内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中国领导人充满自信,国际上成功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则使中国领导人踌躇满志,尝到与苏联平起平坐的感觉。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开始提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主张。

这里的讨论显然是粗略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需要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国际冷战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以中苏关系为案例,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从而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具有原创性的分析和探讨。

(四) 中苏关系的认知性解释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对错误知觉的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奠定了国际关系认知学派的基础。随着杰维斯的理论被引入中国国际

如同它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大约有30—40年的时间差一样,中苏对于马克思主义(即意识形态信仰)的理解和认知也有时代的差距。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475页。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关系学界,错误知觉逐渐成为许多学者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行为的一个新视角。运用认知理论研究苏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但如果我们考察中苏关系嬗变的轨迹,也会发现错误知觉所起的重要作用。譬如,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根据前驻苏联大使李凤林的回忆,对中方而言,要求苏方确认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并不是真的试图收回沙皇俄国从中国划走的土地。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目的是为了安抚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民族主义情绪。更进一步来说,对毛泽东而言,也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争取解决与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边界争端,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为计划之中的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展开提供保证。然而,从苏联方面看来,“不平等条约”是个“套子”。如果边界谈判的协议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则不啻于授人以柄,一旦两国关系恶化,便可能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土的法律依据。毕竟,苏联人不是第一次上了毛泽东的“钩”。在1958年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的秘密访华便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的一枚棋子。当时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赫鲁晓夫访华搞了一个公报,结果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误以为“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赫鲁晓夫对此当然记忆犹新。

笔者这里探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两种分析框架,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的行为究竟是由利益还是由观念决定。对此,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经典论述:“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经常像扳道工一样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关于利益和观念的讨论,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外交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冷战结

在国际关系领域运用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实证性研究,参见王栋:《超越国家利益: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46页。认知理论在冷战史研究中的应用,见张扬:《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与冷战:兼论冷战的知觉错误与过度防御心理》,《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9—135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58页。

同上。

同上书,第358、360页。

同上书,第234页。

转引自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导言第36页。

束原因的大争论。冷战的结束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个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激发了观念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复兴。如果假定存在着客观的国家利益,那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决策者对于“客观”的国家利益可能出现错误认知和判断。因此,错误知觉和意识形态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决策者外交政策判断的重要因素。

譬如,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第一手档案资料,就会发现中国高级领导人中对于赫鲁晓夫的蔑视程度是令人惊讶的。彭真曾在1961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用“与美国勾勾搭搭,替美国涂脂抹粉”来形容赫鲁晓夫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做法。彭真对赫鲁晓夫的这种知觉上的蔑视,在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很普遍。不少领导人甚至直接在内部讲话中用了非常带有侮辱性的“秃子”来指称赫鲁晓夫。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本人对于赫鲁晓夫的知觉性认识直接相关。毛泽东本人极为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并且习惯“信口开河”,“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这种判断和认知,在什么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于中苏关系中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并进而影响了中苏分裂的进程和中苏关系的走向?这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和理论涵义。究竟国家间关系是否由客观的国家利益决定?如果是,那么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阐述客观的国家利益。如果不是,而是决策者认知的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研究者就必须深入考察知觉性变量如何影响决策者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判断。正如杰维斯指出,如果“历史学家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Cold War as a Hard Case for Idea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7, No. 2, 2005, pp. 165—173;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01, pp. 5—53.

《彭真同志报告》,1961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22 国务院外办第五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廖承志同志谈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1962年2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47 国务院、外交部、对外文委中央首长的讲话及有关国家情况资料,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中央:《关于形势的报告》,1963年9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770 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63年3月—10月,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1页。

态度,并且参考双方的文件”,就会发现错误知觉的心理动力机制在起作用。应用到中苏关系的研究上,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重视和研究微观层面的因素如错误知觉在中苏关系变化中的作用。

根据社会心理学,行为体普遍具有的“受害者”心理会产生一种自我正义感,将自己的行为置于道德的高台之上,使行为体倾向于高估对手行为的侵略性,忽视自身行为在对手眼中的威胁程度。陈兼指出,中国集体民族心理中强烈的“受害者”心理倾向的存在,使中国在处理与外部关系中自我正义感的表现特别突出。这种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受害者心理,使中国对于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主权和平等有一种过分的敏感。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中的“雷霆之怒”,也表现在中苏争论中中方的咄咄逼人、得理不饶人的态度。

按照《史纲》的研究,赫鲁晓夫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在世界工联大会上的“突然袭击”的反应。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借机与苏方展开争论,并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率先公开中苏关于总报告的分歧,并积极向其他与会工会代表进行鼓动和宣传。这种行为,在苏方看来不啻“突然袭击”,引起苏方强烈不满,也直接导致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式的反击。正是由于“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使中苏两党失去以平和方式寻找到缩小分歧的结合点的机会。有意思的是,在当时中国的表述之中,布加勒斯特会议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突然袭击”,这种表述也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传统看法。当时毛泽东有一段讲话指出,“我过去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急急忙忙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反我们,他们六七月开中央会议传达到支部,不这样办不好办。毛泽东的结论是:“(他)对我们三篇文章怕,我们不怕‘三无’……三篇文章外国人都说

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67页。

同上书,第62—66页。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282.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280页。

中国方面“突然袭击”的表述,可参见:《刘宁一同志关于反修斗争的谈话(记录稿)》,1964年4月1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212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及本处对外宣传资料,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好,三篇文章是革命的文章,赫鲁晓夫反对我们是他本身需要,对我估计错误,以为用‘几手’[就可以]把我们压下去。我们只批判修正主义,没有说苏联。”

毛泽东的解读显然忽视了赫鲁晓夫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刺激、挑战苏联的反应。毛泽东的讲话从始至终渗透着一种自我正义感:赫鲁晓夫害怕我们革命的三篇文章,所以“急急忙忙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反对我们”,要把中国“压下去”。而且,毛泽东言下之意认为中国只批修正主义,没有点苏联的名当然是顾全团结大局的表现。很显然,中国的自我认知和苏联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错误知觉的存在对中苏之间相互敌意的螺旋式上升起到重要作用:在自我正义感的驱动下,双方都忽视了自身政策和行为对对方利益的威胁,夸大了对方反应的敌意程度,都认为对方充满敌意、蛮横无理。这种机制在中苏关系史中反复出现,对中苏从部分分歧发展到全面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国内政治与中苏关系

在研究中苏关系的文献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析框架,还有一小部分集中于分析国内政治在中苏分裂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部分文献要么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分歧角度考察中国国内政治对中苏同盟产生的负面影响,要么通过梳理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内的派别斗争以考察苏联国内政治对中苏分裂的影响。譬如,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认为,毛泽东的反苏政策使他致力削弱“那些没有全力支

《记毛主席讲话录音》,1961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22国务院外办第五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

对螺旋模式理论的探讨,见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3章。

Richard Thomson, *The Bear and the Dragon* (New York: American Asian Educational Exchange, 1971).

Vernon A. Spaturia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in Douglas Stuart et al.,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Boulder, CO: Westview, 1982), pp. 59—72

持其对苏强硬立场的领导人的位置。”另外,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三卷本经典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对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在中苏分裂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证据。

认为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行为密切相关的“关联政治”观点,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曾令人信服地论证指出,冷战时期的大国通过操控外交危机来动员本国民众以实现其国内目标。柯庆生的分析以杜鲁门启动冷战政策和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两个实证研究为基础。在对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柯庆生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毛泽东有意制造并操控国际危机以便动员中国民众支持其激进的大跃进政策。柯庆生的观点得到新冷战史学派的呼应。例如,陈兼认为毛泽东对于“继续革命”目标的追求使他致力于制造外部敌人以对民众进行动员,包括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罗兹·M.鲁塞(Lorenz Luthi)则进一步论证,在中苏关系中毛泽东也不时动员国内政策以达到影响国际事务的目的。

虽然《史纲》的重点关注并不在此,但也对国内政治因素给予了考虑。譬如,在1958年炮击金门的研究中,《史纲》并没有如柯庆生或陈兼那样考察毛泽东此举的国内政治因素,而是着重于分析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战略目标对中苏协调立场以及此后中苏关系走向特别是苏联对华核援助的影响。通观全书,《史纲》既呼应了国内政治分析框架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对其一些主要观点提出了挑战、质疑和补充。例如,《史纲》呼应了鲁塞的观点,“关联政治”中的“国内政治”——“外交政策”的因果链条实际上呈双向运动:政治领导人不仅通过操纵外交危机动员国内民众以实现国内政治、经济目标,也会通过国内动员

Kenneth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in Herbert E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Seattle: Washington, 1982), pp. 3—28.

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

最早有关“关联政治”的论述,参见 James N. Rosenau,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以实现特定战略和外交目标。国内政治论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果链条方向的确立。以李侃如的观点为例,究竟是毛泽东的反苏政策在先,导致其采取措施反制反苏立场不坚的领导人(如刘少奇),还是反过来,由于其国内政治分歧和斗争的需要,而导致毛泽东采取反苏立场?李侃如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清晰。《史纲》的研究显示,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两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相互渗透,可能比“关联政治”简单的因果链条远为复杂和微妙。

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斗争如何渗入国家安全层面?苏联如何成为中国的假想敌?反修斗争如何与中国国内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史纲》的研究揭示,进入1964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的重估,中国开始调整对苏安全战略,反修方针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中国的军事防御战略方针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防备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进一步影响到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史纲》认为,这一方面为毛泽东继续强化国内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毛泽东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动员国内力量,掀起一场反对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问题,强调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1964年初接见外宾时,毛泽东反复指出,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在1964年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的严峻判断。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毛泽东进而准备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政策,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强调,“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47页。

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在12月底的讨论“四清”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价上发生尖锐分歧。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北京出现两个“独立王国”。1965年1月14日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宣布,运动的重点和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暗潮汹涌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假想敌的论述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并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相联系。

很显然,《史纲》呼应了陈兼的观点,深刻地揭示出国内政治发展的逻辑和需要如何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轨迹。而《史纲》对于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研究,也显示出国内政治的逻辑在一定条件下会淹没甚至扭曲外交政策的战略、安全利益需求。例如,当苏联在中苏边界谈判上做出的让步使得中苏两国关系出现有可能缓和的前景之时,毛泽东部分地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坚持强硬立场,发表关于算领土账的著名谈话,使得矛盾激化、谈判破裂。毛泽东的考虑是通过暂不与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以示意边界军事冲突的前景来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并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和激发国内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对所谓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义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奠定群众和舆论基础。但中苏边界谈判破裂之后,苏联以中国有意收复领土为由,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开始向远东地区增兵,客观上使得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国逐渐走上相互敌对和军事对抗的道路。

三、认同的向度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建构主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重要的理论流派。而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对冷战的结束做出令人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48—351页。
同上书,第364—365页。

信服的解释,这构成了建构主义兴起的背景。认同是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认同,是一个国家/行为体的“构成(国家)对自我和他者的主体间理解和期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认同决定它是将另一国家视为朋友还是敌人,从而决定国家间的相对力量差距是否具有威胁性。

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苏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其中泰德·霍普夫(Ted Hopf)的文章属较有代表性的一例。霍普夫认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解释中苏关系变化的客观性变量如地缘、进攻—防御平衡以及军事威胁等基本上是不变的,因而不能解释中苏关系从盟友到敌人的变化。另外,中苏的共同威胁——美国的相对力量——在中苏分裂的这一段时期则不断增长。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如势力均衡或者“威胁均衡”的观点,面对来自美国的共同安全威胁,特别是美国在东亚以及越南的不断增兵,中苏应当结成更加紧密的同盟。因此,从社会建构主义来看,中苏分裂不是由于物质性的势力均衡的变化导致的,而是由于中苏对自身以及相互理解的变化导致的。换言之,建构主义认为中苏认同的变化是导致中苏从盟友到敌人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为中苏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和思考角度。然而,建构主义理论家如霍普夫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以证明中苏认同的变化如何导致中苏关系的转变。从方法论上来讲,这样的实证研究必须找出中苏认同变化的关键几个转折点,并建立认同变化与中苏关系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性。

以中方为例,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的认同变化可以大致作如下划分:

老大哥 兄弟 半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集团 社会帝国主义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有关国内建构主义研究现状的评述,参见袁正清:《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第142—168页。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对于认同定义的最主要的批评之一是认同的定义从分析性上来看过于松散,无法成为有用的分析工具。近来建构主义学者力图发展出更加严格和精确的定义,以使得认同具有“分析性上的严格”和“方法论上的想象力”,成为社会科学中更加有效的一个变量。参见 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4, No. 4, 2006, pp. 695—711.

Ted Hopf, "Identity Relation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in Rawi Abdelal et al., eds.,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79—215.

中国对于中苏相对权力位置的认知则大体经历了如下变化：

以苏联为首 以苏联、中国共同为首 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对苏联的认同从老大哥到敌人的变化,中国在对苏政策上也经历了从以苏联为首到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变化。

在 1960年 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发生严重的争执。但即使如此,在中国领导人的此后表述中仍将苏联视为“兄弟”。彭真在 1961年 1月的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说道：“苏联搞坏,我们也没有面子,没有光彩,把苏联搞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苏联出乱子,对我们、对世界革命都不好的。应该不出乱子好。彭真强调,“苏联不能离我们,我们也不能离苏联。有的人说,与兄弟国家不好接触,与民族主义国家、亚、非国家好接触,这不对,兄弟国家比敌人是好呢?还是坏呢?总比敌人好。”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与苏方领导人针锋相对、激烈论战,他的这番讲话很能反映出即使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同仍然是盟友和兄弟。

也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相信赫鲁晓夫可以被转变过来。这个期望的破灭是在 1961年 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此后,中共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进入 1962年之后,苏联在新疆伊塔事件中的颠覆活动和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的袒护和支持,使中国对苏联威胁警惕起来。到 1962年底,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过去都是马列主义,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但现在苏联“对中国是一套武装叛乱、颠覆活动,无视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这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不同的路线,是对抗性矛盾,只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表面上,中苏“闷头打官司”,没有“在报上宣布公开斗”,但中国领导人意识到

《彭真同志报告》,1961年 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22 国务院外办第五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73—274页。

《章汉夫同志第一次的讲话(记录)》。

同上。

中国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越来越尖锐,中苏分歧实际已经公开化”。中央外事小组、国务院外办在《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上做了如下阐述:“对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为了争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为了逐步提高中间状态人们的觉悟,在目前仍应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们同修正主义之间的关系,带有某种统一战线的性质。”对此,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要明确地认清,赫鲁晓夫是叛徒,不是无产阶级,不要向他交底。对他不能排除出反美统一战线,但又不能当作阶级兄弟”,“对赫鲁晓夫来说,我们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的,但利用他与美帝的矛盾,拉着他,是个策略。对苏联人民、国家,我们是认真的团结,不是策略;对赫鲁晓夫是策略,拉住他,利用他”。

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是1962年7月黑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黑龙江省委提出:“(世界)革命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共应当“承担起世界共运的领导责任”。面对来自党内的这样“劝进”的声音,毛泽东的反应倒是比较谨慎,仅仅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转发各省,毛泽东似乎认为此时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机会尚不成熟。当然,此举也有试探一下党内风声的意味。但至年底党内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党内“我们要当仁不让,做左派的头子”的呼声已经不绝于耳。在公开提出与苏联争夺领导权的同时,中共高层仍然注意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特意强调“要使人感觉到中国不是为了争夺领导权,不是为了民族利益,不是为了称霸,不是为

《关于我国人民团体的国际活动问题:刘宁一同志在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6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2年12月1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张彦同志讲话》,1962年11月26日上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第281—282页。

《刘宁一同志的发言(纪录)》,1962年11月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

了侵略扩张来和苏联抬杠、争论。我们是真正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的震撼极大,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武装入侵的可能性更加警惕。在8月23日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公开抨击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这标志着中国对苏联身份的认同已经公开变成敌人。这种将苏联变成“帝国主义 敌人的重新定义,也即陈兼提出的中国意识形态“微妙的结构性变化”。陈兼认为,这一变化为“北京为与美国实现关系缓和的辩护提供了迫切所需的意识形态空间”。陈兼的分析将意识形态视作变量而不是常量,意识形态内涵的变化可以导致外交关系上的变化。然而,如果我们从认同变化的角度来看,更可以将认同视作变量。

这里做的回顾是非常粗略的,尚不足以充分检验建构主义的假设,但可以略约给我们一个概貌,即中苏的认同关系是如何转变的。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需进一步证明认同关系转变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关于认同的实证研究还须注意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究竟是认同的变化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变化,还是中苏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认同的变化?如果中苏关系的恶化实际上也对中苏认同的变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那么就必须找出中苏关系和认同的初始条件,然后考察对应的变量变化。

四、对中苏分裂根源的一点思考

正如沈志华所指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多年以来这“一直是各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在《史纲》的代跋中,沈志华提出,观察和理解中苏分裂很重要的一个对照物是当时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冷战期

中央:《关于做好外宾接待工作的几个问题》,1963年8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77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63年3—10月,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第72—74页。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87页。有关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和分析,可参见时任中国领导人主要罗马尼亚语翻译的蒋本良的回忆。蒋本良:《给共和国领导人做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88页。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239—24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466页。

间,西方阵营中远非没有分歧和矛盾,事实上还时有激烈的冲突。美国霸权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法美矛盾甚至导致法国退出北约。但是,尽管如此,西方阵营并没有分裂,而是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阵营则呈现出非稳定性。随着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也趋于瓦解。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呢?

国家(安全)利益似乎能够解释西方阵营的团结:冷战东西方对抗的战略和安全格局,决定了西方国家必须通过相互妥协来保障西方阵营整体安全这一根本利益。但问题是,同样的逻辑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在同样的战略和安全格局下,同样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呢?这样看来,国家(安全)利益解释力并不充分。对这个问题,沈志华认为应该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殊性来寻找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存在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政治范式的先天不足”:一是

认为外部威胁与同盟内部凝聚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是同盟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威廉·汤普逊和大卫·拉普金对西方阵营1951—1973年的同盟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内部合作行为与对苏联威胁的感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参见William Thompson and David Rapkin, "Collaboration, Consensus, and Detente: The External Threat-Bloc Cohesion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5, No 4, 1981, pp. 615—637。有关文献综述参见:Arthur Stein, "Conflict and Cohes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0, No 1, 1976, pp. 143—172。

研究同盟理论的学者几乎很少关注中苏同盟的案例,特别是中苏同盟的破裂。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同盟理论更关注同盟的起源和管理而相对忽视对同盟解体的研究有关。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奥利·霍尔斯特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组研究。霍尔斯特曾使用“情景分析”(content analysis)方法,以中苏关系为案例检验外部威胁与同盟内部凝聚力存在正相关的假设。但霍尔斯特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主要在于其使用的经验数据全部是当时中苏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等资料,因而不免有偏颇谬误之处。譬如,霍尔斯特通过经验数据的验证,发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面对东西方两大阵营紧张对峙局面,中苏对于美国政策的认知高度趋同,呈现压倒性的负面知觉;而当东西阵营关系相对缓和之时,中苏对美认知的分歧则显著增强。由此,霍尔斯特认为同盟理论的假设得到了验证。但通过考察最新解密的中苏档案,冷战史学者发现,在表面的一致对美之下,中苏分歧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其实是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了。事实上,当中苏分裂不断加剧之时,美国对中苏的安全威胁程度并没有显著减少,甚至可以说不断增加。参见Ole R. Holsti, "East-West Conflict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 1965, pp. 115—130; "Exter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Consensus: The Sino-Soviet Case," in Philip J. Stone ed., *The General Inquirer: A Computer Approach to Content Analysi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Exter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Cohesion: The Sino-Soviet Case," in Jan F. Triska ed., *Communist Party-States: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9);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21—325页;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 13。

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是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脆弱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中苏同盟的分裂是在来自美国的外部威胁依然存在的前提下发生的,这是经典同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而,沈志华试图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殊性寻找对中苏同盟破裂的解释,无疑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的同盟理论。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东西方阵营稳定性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两种霸权秩序的差别:美国霸权主导的西方秩序的稳定性,以及苏联霸权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秩序的内在不稳定性。冷战时期中国决策者普遍有夸大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的倾向,“西方世界四分五裂”这样的表述在中国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文件中比比皆是。这种倾向当然与意识形态有关,但也与对西方秩序内在性质和动力机制的错误认知有关。

仅仅用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似乎不足以解释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的稳定性。冷战并不是维持西方秩序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冷战后西方也曾面临尖锐战略、外交利益冲突,如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但美国与欧盟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秩序。这说明即使没有冷战时期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仍然维持了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必须从西方秩序内在的性质和动力机制来寻找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有关国际政治的“宪政逻辑”分析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艾肯伯里以“结构自由主义”来描述和解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内在性质和动力机制。他认为,战后美国主导下构筑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共识性的”和“制度化”的,具有宪政特征。依附于这种秩序之上的是美国“开放式的、非等级制的霸权”。艾肯伯里指出,美国“自由霸权”具有如下的机制:共同捆绑的安全实践有助于缓解安全困境和降低国际政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471—474页。

此处笔者感谢匿名评审的意见。

如中央:《目前国际形势问题》,1963年9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177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1963年3—10月,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3124长:《刘宁一同志关于反修斗争的谈话(记录稿)》,1964年4月10日。

治无政府状态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被渗透的霸权通过使美国的盟友参与、渗透和影响美国的决策过程以增加盟国对美国霸权的认受性;经济上的开放性以达至相互依存的状态;还有所谓的市民认同即对一组核心规范和原则的共识,包括民主政治、宪政政府、个人权利、在种族和宗教方面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等,赋予了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以内在团结性。这种“结构自由主义”是战后美国霸权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在艾肯伯里看来,这些机制构成的“结构自由主义”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保持内在稳定、区别于历史上大国权力政治斗争的最根本原因。

与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多有兵戎相向的先例。这是否有“两种秩序”根本属性上的差距?比较来看,苏联构筑的“国际秩序”或者说苏联的霸权不具有美国“被渗透的霸权”的宪政特征。相反,苏联的霸权具有传统霸权的等级制、刚性、零和等特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强化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等级性”,也赋予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等级秩序以合法性。

按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于认知一致、习惯,以及/或者社会压力等原因,国家倾向于“外化”或者移植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安排。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等级制、刚性、零和以及缺乏妥协机制等性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内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逻辑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投射。根据艾肯伯里的观点,美国国内政治具有的权力分散、决策透明、开放性和具有妥协机制等特征,则折射和反映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之中。

有关艾肯伯里的结构自由主义观点,参见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Politics*, Polity, 2006, especially chapters 1, 3, 4。国内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艾肯伯里的结构自由主义的介绍与评论,最早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13章。近来艾肯伯里的理论引起了国内国际关系学者更多的关注与讨论,参见宋伟:《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欧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5—57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49页;Andrew Moravcsik, “Libe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 159—204。

时殷弘在讨论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时曾提出,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启示、“定焦”、梳理、总结和升华的功能;理论“可以提醒和教导历史学家去洞察、发现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可以提示历史学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于历史的全新理解”。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对中苏关系主要的解释框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与认同等)出发,以《史纲》的史料为基础,结合最新解密的省级档案馆史料,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当然,本文的目标更为有限。也许,本文提出的问题可能比回答的更多。笔者期望这些问题可以促进对中苏关系研究议程的思考,从而有助于我们探寻中苏关系“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

本文是一个尝试,以期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的富有成果的对话。笔者相信,国际关系理论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源和动力机制;同样的,有关中苏结盟和分裂的历史研究也能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从中国冷战研究领域的角度来看,随着更多第一手档案资料的解密,中国冷战史研究对冷战国际史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潜力不断增大,《史纲》即是一个典范。而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之间的自觉对话,也将有助于促进两个领域的交融、反思与发展。

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第9页。

作者简介

吴彤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研究生。2002年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获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tong-wu07@ mails tsinghua edu cn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9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2002年)、《中国法治民主建设之路》(2006年)等。

电子信箱: zhanglh@mail tsinghua edu cn

岳小颖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2004年在悉尼麦克里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2009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邮箱: katherineyue@163. com

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美国外交、国际冷战史。

电子邮箱: wdong@pku edu cn

陈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hotmail com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 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年)。

陈奕平 暨南大学历史系和美国研究中心教授。1990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暨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等。

电子邮箱: tchenyp@jnu edu cn

汪卫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国际事务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联合培养)。先后于 1999和 2002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wangweihua2008@gmail com